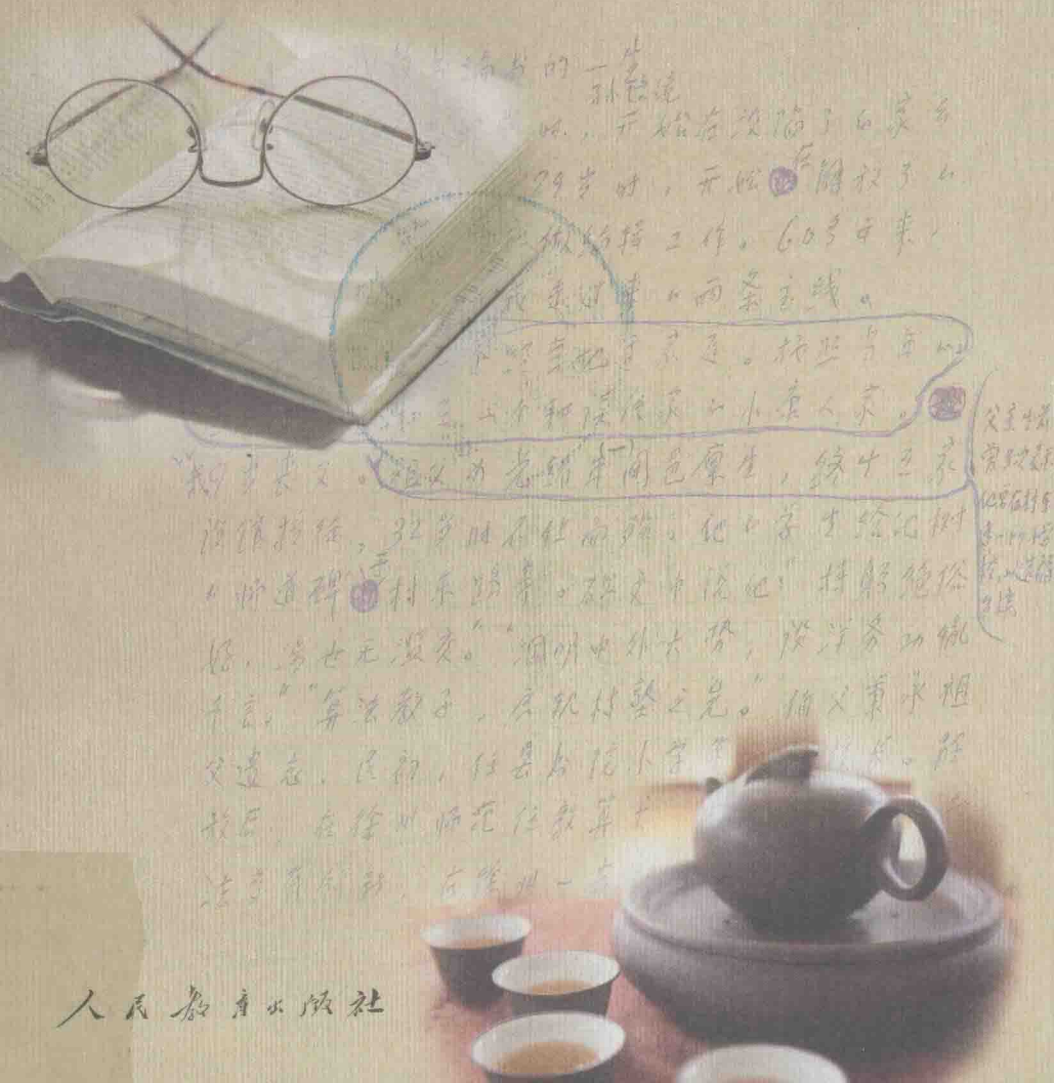


孙培镜 著

编校留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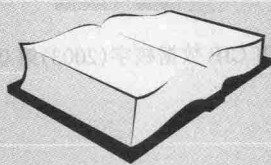
人民教育出版社

編輯留聲



编校留踪

孙培镜 著



人民教育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编校留踪/孙培镜著.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03
ISBN 7-107-16573-9

I. 编…

II. 孙…

III. ①编辑工作—文集②校对—文集

IV. G23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54914 号

人民教育出版社 出版发行

(北京沙滩后街 55 号 邮编: 100009)

网址: <http://www.pep.com.cn>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装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7 月第 1 版 200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90 毫米×1 240 毫米 1/32 印张: 11.75

字数: 290 千字 印数: 0 001~2 000 册

定价: 23.50 元



序

1

孙培镜先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代编辑，曾先后在华东青年出版社、中国青年出版社和文物出版社工作。他几十年如一日，把自己的心血融合在他人的作品之中，无怨无悔。正是这种优秀的品质，促使他不断地钻研编辑业务，不断地提高编辑水平，从而积累了极其丰富的编辑、校对工作经验。这部诗文集的前半部，就是孙先生多年实践经验和研究成果的汇编。

20 世纪 80 年代，孙先生开始进行编辑理论研究。1983 年，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在广西阳朔召开首届出版理论研讨会，孙先生带着他的首篇论文《试析“编辑特有的写作”》与会。正是这次会议，第一次提出建立出版学（包括编辑）的任务。会后，孙先生开始进行编辑学研究，他先后写出了《图书编辑学的几个概念和理论问题》、《关于图书编辑系统的思考》、《建立编辑学刍议》、《杂学、杂家型编辑和编辑杂学修养》等论文，对编辑学的概念、理论以及编辑人才培养等理论和实践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阐述了自己的观点。可以说，孙培镜是我国现代图书编辑学的拓荒者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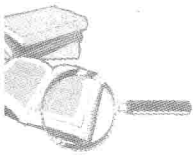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孙先生作为中国版协教育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先后参与策划并组织了 1991 年的“首都青年校对邀请赛”、1992 年和 1993 年的全国优秀校对培训竞赛等活动。1994 年 9 月，孙先生又参与策划了“第一届全国校对理论研讨会”，会上成立“中国版协校对研究委员会”，他出任委员会顾问，开始将他的编辑出版理论研究重心转向校对理论研究。凭着深厚的古文功底，他从研究古代校雠入手，进而探讨现代校对与古代校雠的渊源关系，现代校对对古代校雠的继承和发展，以及现代校对的功能、作用和在出版工作中的地位。他将古代校雠的“校异同”和“校是非”移植于现代校对，为现代校对的功能和作用提供了理论依据，为现代校对学的理论体系的建立作出了特殊的贡献。这些论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也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20 世纪 90 年代初，年逾古稀的孙培镜先生，以对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高度责任感，围绕校对的功能和作用这一核心问题，撰写了一系列论文，如《我国汉文字校对传统初探》、《校对主体、校对功能和校对者的责任》、《校对的识、法、戒》以及三论《校异同与校是非》等。又在这些论文的基础上进一步写了带总结性的《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一文。此文发表于 2001 年，2003 年获第四届全国出版科研优秀论文奖。这一系列论文，澄清了关于校对功能和作用认识上的是非，批评了“校对是简单劳动”等错误观点，进而推动了现代校对理论研究的深入。

上述论文，是作者于 1983~2002 年改革开放后的 20 年间撰写的。作者还在 1996~2003 年写了不少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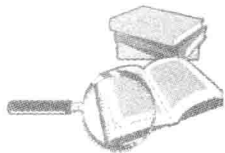




论文反映了作者在编校理论与写作上的不断探索，诗作反映了作者当时的情愫和理念。诗作者把自己对事业、亲友的关爱与期待，把一生教书编书的感受与怀念，净化、美化为诗的语言，组成诗的形式，自娱并寄赠亲友。论文部分，一律在出版专业书刊上作为编校“论文”公开发表过；诗的部分则绝大部分没公开发表过，有诗、歌等各种体裁。对这些诗作，作者是这样讲的：“我写的这些诗、歌等韵言，不古不今，亦古亦今；似律非律，似绝非绝；只求尽情达意，不受传统格律的约束，在今天的人们中却仍然有它的市场。”诚如作者所言，这种体裁和风格的诗作，今天在老中青各年龄段的成人中，都有它的读者。因此，应作为一种民族形式，予以适当的肯定并加以利用，以期用而不废，存而不失。

把论文和诗结集在一本书里，这在一定条件下，有其独特的效用。主要从诗的角度说，这些诗都能直接间接地、或多或少地透出诗作者也是同期论文酝酿者的环境氛围和心态，透出诗作者也是论文作者与周围事物的联系和交流。读者从中可以看到，诗作者也是论文作者在克服生活中出现的某些消极因素（包括年老多病）所作的努力，看到克服这些消极因素对编校论文的写作和编校理论的探索的积极影响和促进。此外，有些诗的主要内容是追记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前诗作者的所见所闻所感的，现在一些原物虽已改观，诗作者当时的感发虽已失去现实的针对性，但仍然可作为对照物，通过今昔对比，更好地认识今天，珍惜今天。因此，它仍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把论文、诗作和作者自传性的《我教书编书的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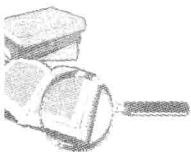


生》三者编排在同一本书里，可以起到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作用，更好地发挥整体效应。这样，作者在同一本书里就可以留下一道比较清晰的踪迹，也可以使读者更有所获益。

我十分欣赏孙培镜先生这些诗文中的精彩论述，更加钦佩孙培镜先生对编辑出版理论尤其是校对理论研究的执著。所以，很高兴为孙培镜同志的诗文集写了上面的话，权作序。

张先

（本序作者为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主席、新闻出版总署原署长）





目

录

1

试析“编辑特有的写作” (1)

编海探礁

——普及历史文物知识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 (10)

图书编辑学的几个概念和理论问题 (19)

编辑工作中的一个“悖论” (32)

关于图书编辑系统的思考 (35)

编辑人员在职教育三题 (47)

建立图书编辑学刍议 (58)

杂家、杂家型编辑和编辑杂学修养 (65)

我国汉文字校对传统初探 (80)

泛论校对弥补编辑之不足 (90)

校对主体、校对功能和校对者的责任 (98)

死校活校源流得失考 (106)

校对的识、法、戒 (116)

编辑代替不了校对 (122)

出版管理机制的“七字准则”

——以校对管理为例 (127)

校对是一门大学问 (131)

校对体制改革散论 (13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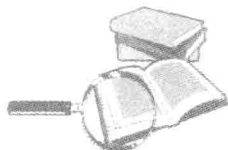
“编校合一”曲与直 (138)

校对增值

——一个值得重视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14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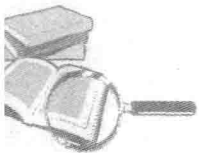
校对如校仇 灭错如扫尘

——从先辈论校雠中采炼传统精华 (144)





校对审美问题初探	(150)
据异同以定是非：校对挑错的一个基本套路	(163)
从先辈论校雠中看超越	(169)
从“校对猎异”谈起	
——也论“校异同”与“校是非”	(174)
试论现代校对的五大功能	(179)
校对监控	
——现代校对一个发育中的功能	(191)
“双校”论百句韵言	(196)
关于现代校对“三性”的思考	(199)
现代校对人员角色定位之我见	(204)
从刘向校雠学中继承什么？	(214)
“编校合一”还是“编校合作”？	(221)
再论“双校”	(226)
试论现代校对学体系的若干板块	(234)
“耐心 静心 适心”三境界	
——汉文字校雠的一个好传统	(247)
三论“双校”	(253)
磁盘原稿校对的两个“结合”	
——“双校结合”与“人一机结合”	(260)
汉文字校雠的源流与传承	(268)
校对学板块歌	(287)
“双校论”小结韵言	(289)
心迹——愧大奖	(291)
附：阙道隆和诗	(291)
周振甫和诗	(292)
申非和诗	(2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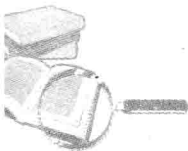


蔡学俭和诗	(293)
张振启和诗	(293)
喜闻又获论文奖	(294)
祝贺并寄语与会师友	(295)
喜读《图书校对学》清样	(296)
附：欧阳广反馈诗	(296)
读欧阳广赠书及附诗	(297)
蒙惠新著读后	(298)
编校五十年有感	(299)
啄木鸟	(300)
寻常日	(301)
附：喜读《寻常日》	(302)
无负母院海	(303)
父女两代出吾门	(305)
重阳节茶话会	(307)
再次出席重阳节茶话会	(308)
红楼重聚会	(309)
辛巳年诸老重阳重会	(310)
喜来访	(311)
八旬虽老可勿衰	(312)
天涯传心声	(313)
附：窗前	(314)
凌晨闻子规	(315)
思转	(316)
闻两岸少儿今日“读经”	(317)
汉字短品可成书	(319)
大风中病榻观松	(321)
附：天人合一	(321)





老病杂感	(322)
有待	(324)
蛰居冬盼	(325)
和道隆《夜坐》	(326)
附：夜坐	(326)
寄老年亲友	(327)
光明温暖似冬阳	(329)
迎新自述	(330)
七十五岁念师友	(331)
七八初度有感	(332)
八旬盛世	(333)
灵岩访古	(334)
游嵩山追记	(335)
衡山一日游追记	(336)
三游玄武湖追记	(338)
五临西湖	(340)
集安高句丽遗址掠影	(343)
游晋祠	(346)
徐州云龙山	(348)
吐鲁番二日游	(350)
文明之树众人栽	(352)
 我教书编书的一生	 (3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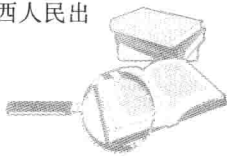


试析“编辑特有的写作”^{*}

1

长期以来，社会上流行一种说法：“编辑工作就是剪刀浆糊，勾勾划划，不甚高深。”编辑队伍里也有人认为：“什么‘为人作嫁’，‘甘当无名英雄’，那才是傻瓜哩。编辑要搞出自己的作品，让社会承认，那才是明智的实力政策。”在这种舆论面前，少数对本职工作马虎敷衍，冷热无常，却热衷于利用编辑岗位之便，极力经营个人作品的编辑，更加振振有词，以为得计；而另一些长期埋头编辑工作，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工作卓有成效，但无力分心从事个人的写作和翻译活动的编辑，则感到委屈和不平。社会上一些不明真相的人，也往往对前一种编辑炎炎而厚，对后一种编辑凉凉而薄。影响所及，一些刚走上编辑工作岗位的青年，就迫不及待地去经营自己的作品，而忽视对编辑基本功的掌握；一些不算年轻的编辑，长期所职在此而所骛在彼，一直不能确立专业思想；在评定编辑职称中，有人过分强调个人的作品，把个人作品的多寡，作为评定编辑业务职称的重要的甚至必备的条件，而对编辑的文字加工、审稿报告等，则认为一律算不上写作，比不上个人作品。在酝酿建立编辑工作责任制时，也有人单纯着眼于挣得从事经营个人作品的的时间，而不是着眼于精益求精地、超额地完成编辑计划。这样，就势必影响整个编辑队伍的稳定和提高，使本来就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编辑力量，有越来越不适应的潜在危机。

* 本文原载于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编：《出版研究年会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3 年出版。





上述对编辑和编辑工作偏见的形成，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们对编辑工作的“为人作嫁”和“甘当无名英雄”的特点缺乏了解，甚至有所误解和曲解；而“为人”和“无名”这两点，恰恰是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撰写本文的目的，正是也仅仅是试图从编辑的文字工作的角度，来揭示编辑工作的这种特点、本质属性和特殊作用，并把编辑的文字工作同作者的文字工作作些比较分析，庶几对消除偏见，对提高专职编辑工作者的光荣感，能起到些许积极的作用。至于对那些视“为人”和“无名”为傻瓜的人，恐怕就很难起什么作用；人各有志，不可强求啊！

(一)

在阐述本问题之前，先讲讲“编辑特有的写作”这个名称的由来和含义，也算是正名吧。

从广义上讲，凡是会写字的人，都会有自己的写作活动，如写封信，写份思想小结，写篇发言稿等都是。本文所说的“编辑特有的写作”，既不是这种广义的写作，也不是通常所说的著作家的写作，而是编辑人员为完成编辑出版任务所从事的文字工作。其内容大量体现在对作者的作品所作的加工上，其次体现在审稿报告、出版前言、编者的话之类的文字上。编辑的这些文字工作同作者的写作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后者是对自己所要写作的素材进行加工、创作；前者则是在作者加工、创作的基础上进行再加工、再创作。后者是为了发表、出版自己的作品而进行的文字工作；前者则是为了发表、出版别人的作品而进行的文字工作（这里略去二者相同的大目标）。后者接纳了前者的思想、文字，以一部作品、一篇文章的完整形式出现，并出示作者自己的姓名（或笔名）；前者则分散、隐没在后者之中，既不留名，也不显迹。除此而外，二者还有个重要的共同点，这就是通过“写”而进行创造性脑力劳动。根据这一





点，并为行文方便起见，本文姑且把编辑的文字工作名之曰“编辑特有的写作”，简称“编辑的写作”，以示同作者的写作互相联系又互有区别这一特点，同时也便于揭示它“为人”和“无名”这一本质属性。

(二)

正因为编辑工作的本质属性是“为人”和“无名”，当人们对此缺乏真切了解时，就容易误以为编辑工作只是为作者的文稿作些剪贴、勾划、修补的简单劳动服务，同作者的著书立说无法比拟。事实果真如此吗？

诚然，作者写作的文稿很重要，它是编辑加工的对象，也是编辑加工的前提和基础。无此，则编辑加工势必成为“无米之炊”（除非编辑自己写稿，即让编辑成为作者；但按照分工，这又要有别的编辑对该稿进行审读加工）。不过，根据我长期从事编辑工作的经验，仅仅经过作者的写作而能完全达到出版水平的文稿，固然也有，但不是很多；有些文稿基础虽好，仍须编辑作一定的文字加工。有些文稿观点、材料和文字都不差，只是由于不适合特定读者对象的阅读需要和阅读水平，也需要编辑作较大的加工；有些文稿甚至只是“半成品”或“毛坯”，所需要的编辑加工量就更大了。

诚然，作者写出一篇成功文章或一部成功作品，确实需要相当深厚的功力；而这种功力，也确非一般编辑工作者所能代替。这是因为，一个编辑要处理很多不同内容、题材和体裁的文稿，因而不可能对他所处理的每一部文稿都像该稿的作者那样专精。但是编辑在一个较为广阔的知识、学术领域里，往往比一个具体的作者要博一些；而且编辑也不是无所专精，他的专精可以体现在某一门学科上，至少体现在编辑工作本身。编辑了解本职工作所固有的规律，能够在比一个具体作者所占有的知识领域宽广得多的范围内，





对各种尚未达到出版水平的作品，进行加工，使之臻于成熟，达到出版水平。

4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一个有不少作品问世的作者，可以不善于把他人的半成品加工成为成品；他自己的作品在未经编辑加工之前也可以并非成品。另一方面，一个能为他人的作品补漏纠偏，润饰增色，甚至起死回生的编辑，也可以没有什么“大作”问世。这些都应该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的。

社会发展到今天，作者和编辑进行分工是完全必要的；各有专攻和专长是分工的需要，也是客观事实。我们不应该因为某一位称职的编辑没有写出自己的作品而贬抑他，正像不应该因为某一位有成就的作者不善于做编辑加工工作而贬抑他一样。话又说回来，既然编辑和作者都是在同一的文稿上进行文字工作，二者之间有那么重要的共同点，则二者之间的不同点也并不是不能沟通的。因此，一身而兼二者之长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随着社会和教育科学文化的发展和进步，将来还会更多。因此，编辑在完成本职工作而“行有余力”的情况下，积极从事个人作品的写作，或者编辑部根据他的专门知识和写作能力分配他承担计划中的某些选题的写作和翻译任务，这都是顺理成章的事，对整个出版事业的繁荣和编辑人员的培养和提高都是有利的。而且，编辑通过缀文写书以提高文字能力，体会作者的甘苦，这对进一步做好编辑工作也是很有必要的；同时，有利于“以文会友”，更好地与作者相结识。但是，在编辑任务繁重的情况下，如果需要某一位编辑专门从事组稿、审稿和加工等“为人作嫁”的工作，从而“夺”去了他单独著书立说的机会，那也理当视为正常的现象。这不仅是社会分工的需要，也是作为无名英雄的编辑特有的光荣感所赖以建立的基础。然而，有人偏偏只根据这一点，就断定后一种情况下的编辑不如前一种情况下的编辑成就大，水平高，这显然是极不公正的。再说，关于编辑队伍的建设，从战略上考虑，思想建设无疑应放在首位。为此，必须





牢牢把握住以下原则，即确认：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大目标下，编辑帮助作者为一部书稿、一篇文章的出版、发表付出创造性的脑力劳动，促使作者“功成名遂”，而编辑自己却不居功，不要名，这正是一种共产主义精神，也是决心终身从事专职编辑工作的同志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如果对所有的专职编辑人员不是用这种精神来要求、来武装，而是单纯地或主要地以著书立说、成名成家作诱饵，那不但从根本上违背了社会主义出版事业的根本方针和党的思想政治工作原则，而且还必然要从思想上以至组织上瓦解我们本来就不够巩固、不够强大的编辑队伍。

（三）

我们不仅要看到编辑工作具有的“为人”、“无名”这两个本质属性，还要看到它对作者的作品的成熟所起的特殊作用。这种特殊作用，足以说明编辑工作并不是“无甚高深”的。

“编辑的写作”，特别是编辑加工，对作品的成熟和出版绝不是无足轻重的。尽管编辑也有把他人的“嫁衣”做得不时兴、不可体的时候，但这毕竟是个别现象，而且编辑部门自身应该也能够加以纠正。这一点并不影响我们得出以下结论，即：“编辑的写作”是作者的写作的延续，二者构成一部（篇）作品的完整创作过程，对每部（篇）成熟的作品都是不可缺少的。从总体看，如果二者非要比出个高低不可，那正像一则寓言里所说的口和胃争功一样，恐怕永远也争不出个结果来。总之，两种“写作”作为心理学上的“能力”、“才能”，具有文字工作的共性，可以互作“熟练迁移”；而作为社会分工，则各有所职，各有所长，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互相周济，互为依存，而不能彼此取代。因此，不可能把它们分出高低，也不应该对它们有所厚薄。

只要从总体而不是从局部看，从长远而不是从一时看，就会知

